

十七世紀中土文人的臺灣記憶－以高拱乾詩文為考察對象

吳盈靜*

摘要

十七世紀是海峽兩岸關係發生巨變的年代。自臺灣而言，乃歷經了由歐洲大航海時代席捲而來的殖民地時期、中土易代之際作為海外扶餘的明鄭時期，而進入全面漢文化洗禮的清領時期，這是海島臺灣漸趨內地化的過程。而臺灣之於中土，則一向既是朝廷認定的犯罪淵藪地，又是移民希望之所在，這官／民的認知差距，終於在納入中土版圖後逐漸統合，其中，宦遊文人的“發現”並“書寫”臺灣，具有重要的關鍵意義。

大抵而言，不論是三年一任的官吏，或短暫值勤的公務員，或僅是幕客身份，他們的筆墨多有海天遊歷的感懷。本文擬以康熙三十一～三十四年（1692-1695）間任分巡臺廈道兼理學政的高拱乾為考察對象，一則他係北人作南遊（陝西→閩浙臺灣），再者他兼具遊人雅興，文采飛揚，除纂輯《臺灣府志》外，又始作臺灣八景詩，並〈澄臺記〉、〈臺灣賦〉等文，他的作品更影響了兩年之後郁永河的《裨海紀遊》，是十七世紀臺灣記憶書寫中的佼佼者。故本文將分三部分進行梳理，一者先就傳統「士不遇」的命題探究他銜命來臺的情思，再者闡述他的感官之旅，藉以說明其“知覺”臺灣的經過，三者論及他如何召喚歷史來表現情志，進而記憶宦臺歲月。上述三者，皆以高拱乾詩文為主要論述來源，旁及時人對高拱乾的評價，希冀作為十七世紀宦臺文人臺灣記憶書寫研究之範例。

關鍵詞：宦遊、臺灣、記憶、高拱乾、臺灣府志

* 筆者為嘉義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言

十七世紀是臺灣的海島屬性漸趨內地化的關鍵百年，從安徽人沈有容渡海征倭（萬曆三十年，1602），到荷蘭據臺（天啓四年～永曆十五年，1624～1661）、鄭氏王朝領臺（永曆十五年～永曆三十七年，1661～1683），乃至於清廷納入版圖（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臺設置府縣，駐防官兵，敷傳文教等，這百年足跡，不但可見臺灣的歷史更迭，同時也讓海峽兩岸正式產生文化聯繫，尤其是來臺清吏開始“發現”臺灣，並在行遊之際運用彩筆建構他們“觀想”中的臺灣。

其實十七世紀中土文人書寫臺灣可以溯及那位隨沈有容出征的明代儒將陳第，他意興風發，樂遊山水，已逾耳順之年還完成臺灣史上第一篇遊記〈東番記〉（1603），雖然不盡詳實可靠，卻開啓並影響了後人對臺灣的重視。¹在他之後，則有王忠孝、徐孚遠、盧若騰、沈光文、朱術桂、鄭成功、鄭經等人，不過他們身上背負反清大業，遺民色彩特濃，在他們筆下，臺灣成爲海外扶餘，是寄託希望、抒發鄉愁的所在。相對於這些遺民文人，滿清領臺之後的宦臺作家則較具有探險遊歷的心情，儘管他們總以殖民者的優越感來省察這塊“新疆”地方。屬於十七世紀的宦遊書寫者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任諸羅縣令的季麒光、康熙二十六年（1687）任臺灣府儒學教授的林謙光、康熙二十七年（1688）任臺灣縣知縣的王兆陞、康熙二十九年（1690）任水師左營守備的王善宗、康熙三十年（1691）任海防同知的齊體物，以及康熙三十一年（1692）任分巡臺廈兵備道的高拱乾、康熙三十四年（1695）任臺灣府學教授的林慶旺、任臺灣縣知縣的李中素、康熙三十六年（1697）任採硫重職的郁永河等人。其中，除了與沈光文等人首創全臺第一所詩社（東吟社）的季麒光、完成最早的臺灣志書（《臺灣紀略》）者林謙光，及寫出極爲完備的遊記體敘事文（《裨海紀遊》）者郁永河等三人諸作已備受研究者關注外，尙有一人亦值得留心，即繼蔣毓英之後二修《臺灣府志》的高拱乾。

籍隸陝西的高拱乾是當時臺灣最高文官，就宦遊文學中殖民者／被殖民者的觀察角度而言，他的作品甚具典型性，同時他也被連雅堂視爲臺灣八景詩的開創者，因此，兼具官吏之身、遊人之眼與詩人之性的高拱乾應該被正視，不應只著眼於其治臺貢獻與府志的編纂之功，而在宦遊文學洪流中被湮沒，故本文擬從高拱乾相關詩文著作中尋跡探究其臺灣記憶，包括他被派駐來臺，進而知覺臺灣、形塑臺灣的過程。

二、安適其所／不得其所：高拱乾的遇與不遇

¹ 關於陳第〈東番記〉的創作始末及其內容，可參閱許俊雅〈陳第與東番記〉一文。收入許俊雅《臺灣文學散論》頁199-233，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11月。

高拱乾係陝西榆林衛人，根據《臺灣府志·秩官志》的記載，他並非科舉出身，而是仰賴祖恩的「蔭生」。先是任職泉州府知府，後蒙「督撫兩院會薦」（按：指閩浙總督興永朝、福建巡撫卞永譽）而陞補臺廈道，自康熙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1692-1695)在臺任職。²他由從四品的知府官「陞補」為正四品的臺廈道，中間過程有些曲折，因為依定例臺廈道出缺，應由內地道員調補，為此閩浙總督興永朝先後上二疏力請破格擢用，疏中一方面詳析臺廈道一職負有「安戢兵民，撫綏地方」的重責，故不能只是循謹守分，還必須才識過人方能勝任愉快，而閩省道員並無此人才；一方面則強調「人地必當合宜，材質各需器使」的道理，因此極力薦舉「才守兼優，年力並壯，有膽有識，能慎能勤，留心瀕海之情形，熟悉巖疆之風土」的高拱乾，最後終獲補授。³來臺一年後，他回憶此項殊榮而吟成一詩，⁴詩中有「不才何比數，盛世幸遭逢」、「辱與循良列，知蒙特達隆」、「背曝暄思獻，天高恩更崇」、「敢言章有德，祇識報無窮」等句，句句是「得遇」之感恩與效忠之心切。觀其實心治臺情形，亦果然是良吏任事，人地相宜，⁵如此看來的確是安適其所了。然而矛盾的是，在其若干作品中，卻又流露不得見用的憂慮與虛度光陰的感嘆，同時說服自己當胸懷有容，並過起漁樵忘機的悠遊生活，且看〈東寧十詠〉一組詩，⁶所吟詠者泰半是此種心境，比如第三首：

州縣功名寧復論，承家世受 國深恩。拂鬚自昔輕參政，強項從來動 至尊。客去留詩魚挂壁，吏閒無牘雀羅門。韶光拋擲真堪惜，野杏春深落滿村。（之三）

前四句自剖出身與性情，後四句則道出宦臺者的清閒無聊。詩人原是個性情倔強，視功名如浮雲的人，但受祖蔭國恩而仕宦，來臺後卻發現日子十分清閒，沒有公文可批閱，也很少人登門求告，大概只有與文士賓客雅興作詩而已。如此清閒生活並非詩人所願，他有虛度光陰的無聊感—可惜了這韶光，可惜的恐怕不僅是空負好光陰，還有一種理想未伸，人生虛度的遺憾，只能坐看野杏凋落，這「野」字，恰透露了詩人彷彿被貶遠地的心情。這份情緒，在第四首與第七首詩中更加清晰可見：

春臺廣廈銜虛署，校藝監軍職濫分。無力椎牛頻饗士，有時倒屣細論文。平生拙處勞難補，異域愁來酒易醺。筋力未衰官興淺，函關西隔萬重雲。（之四）

² 見高拱乾修《臺灣府志三種（上）》頁 526，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5 月。

³ 關於閩浙總督興永朝的疏文，可詳見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之十〈藝文志〉所收（同 2，頁 1021-1034）。

⁴ 收於高氏《臺灣府志·藝文志》（同 2，頁 1161-1163），題為〈康熙三十二年（1693）春蒙 聖恩賜袍至臺恭紀二十韻有序〉。

⁵ 高拱乾的治臺政策與認真情形，可參石弘毅《清代康熙年間治臺策研究》頁 87-103。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年 1 月。

⁶ 高拱乾〈東寧十詠〉見載於高氏《臺灣府志·藝文志》（同 2，頁 1165-1171）

尺檄如傳空谷聲，阻風經月少人行。關山已歷三千里，檣櫓猶遲十一更。
地暖臘殘無雪到，憂深鬢裏任霜橫。眼穿何處天邊雁，京雒難忘故舊情。
(之七)

顯然詩人是憂深愁悵的，在三千里、萬重雲外的臺地只能以文酒填補閑虛日子，即使是地暖春回的季節，也無法開顏，鬢霜裡藏著的是對故鄉的懸念，而「平生拙處勞難補，異域愁來酒易醺」、「眼穿何處天邊雁，京雒難忘故舊情」等句不正是遭貶者容易引發的自怨自憐嗎？在這個檄令難傳、人煙罕至的地方當官實在不能發揮所長，難怪「筋力未衰官興淺」了。故當臺灣鎮總兵穆維雍擢掌禁軍，即將回京之際，詩人自然興起「何日平原春草綠，驂騮重騎五花文」的感懷。⁷這種心懷憂思，藉文酒以澆塊壘的生活情境令人不得不生疑，當初督撫保舉時的「人地相宜」之說及他自云「盛世幸遭逢」的殊榮喜悅，是否只是朝廷一方得人的用心與他忠君思想策動下的制式說法而已？就高拱乾個人情志來說，恐怕不是安適其位，而是「不得其所」，亦即盛世遭逢之「遇」僅是表象，「士不遇」的苦悶焦慮才是事實。

邊地犯愁，卻又必須任滿三年，高拱乾遂讓詩酒論文不再是被動消極的生活填充物，而轉化為與世無爭的悠閒姿態，如第五首所云：

有懷須學藺相如，每遇廉頗獨讓車。晚圃晴霞秋習射，半窗苦竹午臨書。
群公望隔三山杳，聖主明周萬里餘。素志漫言伸未得，忘機直欲混樵漁。
(之五)

他以藺相如自期，要胸懷寬大，文官武將不能鬥氣（看來文武不和的問題早在清領初期已浮現，大概是當時清廷以武治臺，設臺灣鎮總兵，賦予重權厚兵，復令臺廈道牽制之，然道臺標兵來源又需取之於總兵，相互監督的結果，自然產生情結，清代臺灣吏治不良多由此衍生）⁸。而臺廈道雖是文官，但負保境安民之職，故有習射之必要，有臨書之本分。既然聖主遠在萬里外，杳渺難望，有志難伸，那麼就學漁樵忘機吧！化為具體的行動是修斐亭、築澄臺，以成就他交遊攬勝，釋懷澄慮的生活風貌。觀其〈澄臺記〉一文有云：

古者，臺榭之作，誇遊觀而崇奢麗，君子譏之。若夫制僕費約，用以舒嘯消憂、書雲攬物，斯高人之所不廢，亦廉吏之所得為也。臺灣之名，豈以山橫海嶠，望之若臺；而官民市廛之居，又在沙曲水匯之處耶？然厥土斥鹵，草昧初闢，監司聽事之堂，去山遠甚。匪特風雨晦明，起居安息之所，耳日常慮壅蔽、心志每多鬱陶，四顧隱然，無以宣洩其懷抱；並所謂四省

⁷ 此二句詩見於高拱乾〈送臺鎮穆公擢掌禁軍之京序〉一文最後的〈折柳贈別〉之詩。該文收於高氏《臺灣府志·藝文志》，同2，頁1073-1077。

⁸ 關於清代臺灣文武官員的關係，可詳見許雪姬《清代臺灣的官僚體系-北京的辮子》頁62-78，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年3月。

藩屏、諸島往來之要會，海色峰光，亦無由見。於是捐俸鳩工，略庀小亭於署後，以為對客之地；環繞之竹，遂以「斐亭」名之。更築臺於亭之左隅，覺滄渤島嶼之勝，盡在登臨襟帶之間；復名之曰「澄」。…當風日和霽，與客登臺以望，不為俗累、不為物蔽，散懷澄慮，盡釋其絕域棲遲之歎，而思出塵氛浩淼之外，則斯臺比諸「凌虛」、「超然」，誰曰不宜？豈得以文遜大蘇而無以記之也。⁹

臺灣是個「山橫海嶠」之地，山的高聳與海的壯闊，本就是天地之“大觀”。身處海上交通要道的臺島，住所卻不見海色峰光，於是藉由亭、臺的設立建構，啟動暗示一種動態行遊的意圖，不必真要登山臨水，也可達到山水遊觀的樂趣。更重要的是，在這有限空間內的凝神觀照，獲致的不僅是山海景物的美感經驗，還有一種屬於觀者個人生命情境的提昇，即如高拱乾在亭臺建造前是「耳目常慮壅蔽、心志每多鬱陶」的，建造以後，藉著登覽的活動，一方面應目攬勝（「覺滄渤島嶼之勝，盡在登臨襟帶之間」），一方面則會心體認超然的生命境界（「不為俗累、不為物蔽，散懷澄慮，盡釋其絕域棲遲之歎，而思出塵氛浩淼之外」），而達到「舒嘯消憂、書雲攬物」的目的，這也正是傳統文人另類的遊觀型態。¹⁰

雖然高拱乾自比蘇東坡遊於物外的樂遊心態（〈超然臺記〉），也有幾分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自覺了悟（〈岳陽樓記〉），但畢竟自我寬慰的成分居多，他仍舊羈絆於物之內，隨之悲喜起落。因為在臺的寂寥憂思隨著任期屆滿，將陞調內地時化解，他開始笑看這段宦臺期間的作為，從「自笑浮名終日累，海濱漫守使君碑」（〈東寧十詠〉之九）二句詩，大概可以想見詩人如何端出閱讀記憶中的歷史人物—羊祜與歐陽修—以交疊自己的宦遊經驗。三世紀中葉的襄陽父母官羊祜，也是位樂遊山水的文人，常喜造訪峴山，把酒吟哦，有一回與下屬登臨嘆息，感於此山恆存，可自古來此登眺的眾多賢達勝士卻湮沒無聞，令人悲傷，這是大自然的永恆對顯出人類生命限度的浩歎。但最後羊祜突破人的有限性，以其善政贏得與峴山同存不朽的聲名，其魂魄依附在紀念碑上，供後人永久的憑弔與祭祀（事見《晉書·羊祜傳》）。然而此事件卻在十一世紀的歐陽修筆下遭受質疑—「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峴山亭記〉），原因是原本沒沒無名的峴山乃因羊祜而顯著，由此推測當年羊祜的感嘆有著欲流傳千古的用心。姑不論歐陽修的批評是否公允，在高拱乾的認知中，他向慕羊祜紀念碑背後所代表的恆存意義，治臺有方的他也期待在臺政績「不被遺忘」，而自嘲名利累心。其實他的期待，正代表他被忽略的事實，這種被忽略的現象早在其公移文〈嚴禁歲考鑽營招搖示〉中便有隱隱的憂慮：

⁹ 文見高氏《臺灣府志·藝文志》（同2，頁1137-1139）。

¹⁰ 關於亭臺作為傳統文人的遊觀型態之討論，可詳見柯慶明〈從「亭」、「臺」、「樓」、「閣」說起：論一種另類的遊觀美學與生命省察〉一文。收入其《中國文學的美感》一書，頁275-349，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1月。

…自蒙督、撫兩院會疏上薦，奉命持節東寧；蒞任以來，殫精求瘼。凡於地方應行、應止之事，輯綏調劑，不避勞怨。惟期無愧衾影、毋墜家聲。內地遠隔重洋，或未甚悉；台中士庶，宜無不共聞共見者。¹¹

內地遠隔重洋，不一定明瞭他在臺灣的作為，只能退求其次，希冀臺地百姓瞭解其苦心，他是低調默默從事的人，果然日後志書中的循吏傳都未有他的一席之地，還好他在任期最後一年，有感於「攬轡澄清乏寸功」，故要「聊訂新編當採風」（〈東寧十詠〉之九），遂編修完成《臺灣府志》，他彷彿意識到，唯有如此，才能在歷史留名。

此外，當年因其有志難伸，欲作山水遊觀所建的斐亭與澄臺，亦成了後人八景摩寫中的重要場景，他的〈臺灣八景〉詩，正是一場知覺臺灣的感官之旅，而其對境抒懷的〈東寧十詠〉詩與〈澄臺記〉、〈臺灣賦〉等文除點出不遇之困愁外，更進一步記憶他眼中的臺灣。

三、知覺臺灣：高拱乾的感官之旅

高拱乾首創的臺灣八景詩，即〈安平晚渡〉、〈沙崑漁火〉、〈鹿耳春潮〉、〈雞籠積雪〉、〈東溟曉日〉、〈西嶼落霞〉、〈澄臺觀海〉、〈斐亭聽濤〉八首，從「渡」、「崑」（即鯤）、「潮」、「溟」、「嶼」、「海」、「濤」等字眼充分表現臺灣的海洋地理，已有研究者討論八景詩中的海洋景觀及其蘊含的文化符碼，¹²也有論者全面解析清代的臺灣八景與八景詩，並進行分類，¹³可見當年高拱乾的八景書寫帶動流行風潮，並造就了清代臺灣文學中的一種次文類。

大抵而言，高拱乾的八景詩作不純乎自然寫景，往往將人文活動雜揉其間，透過視覺、聽覺與觸覺來感知臺灣，同時運用置「身」其中的空間感來馳騁想像，透顯一顆試圖假山水以安頓靈魂的心。如果聽覺與視覺係發自耳、目，那麼觸覺與想像就是身、意的作用了。且看〈安平晚渡〉：

日腳紅彝壘，煙中喚渡聲。一鉤新月淺，幾幅淡帆輕。岸闊天遲暝，風微浪不生。漁樵爭去路，總是畫圖情。

詩中先以觸覺一足踩荷蘭人修築的安平堡壘之上，復以聽覺一迷濛煙波中傳來船

¹¹ 文見高氏《臺灣府志·藝文志》（同2，頁1043-1045）。

¹² 如陳佳奴《清代臺灣記遊文學中的海洋》第四章，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年7月。

¹³ 如劉麗卿《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4月。

客與船夫的互動聲，首二句已點出歷史感與現實感。接著盡情發揮其視覺印象，仰視天上一彎新月，平觀海上漁船點點，再由近及遠，遼闊的不只是岸邊，還有那暮靄沈沈的天際，身體放鬆的感受晚風習習，波浪不生的平靜海面，正好提供詩人的想像介面，這一幅人文風景，恰貼合了詩人的悠然之心。

同樣的寧靜觀照，還見於〈沙崑漁火〉：

海岸沙如雪，漁燈夜若星。依稀明月浦，隱躍白蘋汀。鮫室寒猶織，龍宮照欲醒。得魚烹醉後，何處曉峰青。

夜裡的海岸沙，白細如雪，是月光下覷見的雪白，抑身體撫觸間的細緻感覺？首句詩已點燃了詩人的感官知覺，接下來的漁燈若星、明月映水，乃至於因海通向天河，而遙記銀河一端兀自耕衣不斷的織女，以及白汀印月，深怕驚擾了海底龍宮等聯想，更加深此處的清冷幽靜。最後「得魚烹醉」，儼然在一片海邊月色中嗅著鮮魚醇酒的美味，跟著味蕾舌動，品嚐美酒佳餚，比起前詩來，這首更有一份旅人的浪漫與陶醉。

高拱乾在四面環海的臺灣行遊，除了賞看晚渡、漁火等與百姓生活近距離接觸的場景外，另有東溟觀日出、西嶼賞晚霞，以及在人為搭建的有限空間內（如澄臺、斐亭）與文人墨客進行觀海、聽濤的交誼活動：

海上看朝日，山間尚曉鐘。天開無際色，人在最高峰。紫閣催粧鏡，咸池駭浴龍。風流靈運句，灼灼照芙蓉。（〈東溟曉日〉）

孤嶼澎湖近，晴霞返照時。秋高移絳樹，海晏捲朱旗。孫楚城頭賦，劉郎江上詩。淋漓五色筆，直欲補天虧。（〈西嶼落霞〉）

日升日落，是大自然的定律，也是古來詩人喜吟善詠的景象。高拱乾海上觀朝日、聽晨鐘、賞晚霞，享受一種飄渺的美感，在晨夕觀景之際，有來自遙遠的神話想像，如仙鄉紫閣、日浴咸池，¹⁴也有記古人詩風以與景色交輝，如曾被譽為「出水芙蓉」的南朝山水詩人謝靈運、具有玄虛傾向的魏晉詩人孫楚，以及被遠貶南荒，擅寫民歌竹枝詞的中唐詩人劉禹錫等，他們的五色彩筆，直可媲美於女媧的五色石。高拱乾運用神話與詩的力量展現摹景紀遊的功力是十分可取的。此一功力也見諸下兩首人文風景詩：

有懷同海闊，無事得臺高。瓜憶安期棗，山驅太白鰲。鴻濛歸紫貝，腥穢滌紅毛。濟涉平生意，何辭舟楫勞。（〈澄臺觀海〉）

¹⁴ 《淮南子·天文訓》中云：「日出于暘谷，浴於咸池。」

島居多異籟，大半是濤鳴。試向竹亭聽，全非松閣聲。人傳滄海嘯，客訝不周傾。消夏清談倦，如驅百萬兵。（〈斐亭聽濤〉）

澄臺「觀」海，觀的其實是一己之懷抱。登高望海，可以開闊襟懷，詩人浪漫憶及仙棗亭的傳說與巨鰲戴山的神話，¹⁵又理性觀照鴻濛初開，漢人來墾，荷蘭進出臺灣的歷史氛圍，最後以殫精竭慮，不辭舟勞作結，這是接受海洋洗禮後的正向思考。相較於個人式呢喃的澄臺觀海，斐亭聽濤則是集體行爲，炎炎夏日裡，亭內是詩人與眾賓客的清談闊論，當倦了累了，焦點移轉，開始傾聽亭外濤鳴，這濤鳴，有人傳言是滄海之長嘯，賓客則更凝成戰爭的神話想像一何以地不滿東南？原是共工與祝融戰，不勝，怒而觸不周山崩使然。¹⁶有趣的是，這種「如驅百萬兵」的怒濤聲在島居文人們聽來，都是「異籟」一亦即視臺灣為「他者」的存在。

倘若〈澄臺觀海〉是在壯闊眼界中見其懷抱，〈斐亭聽濤〉是在特定建築空間內透過聆聽，有距離的欣賞浪濤奔湧，那麼〈鹿耳春潮〉則是親見怒滔巨浪，在觀潮之餘顯現一種人道關懷：

海門雄鹿耳，春色共潮來。二月青郊外，千盤白雪堆。線看沙欲斷，射擬弩齊開。獨喜西歸舶，爭隨落處回。

詩人慣常用「雪」來形容海邊景致，如海沙、白浪等。「千盤白雪堆」一句大概可想見鹿耳門海潮的壯觀，不過詩人並不著意於此，反著急那些尚盤桓於海上的漁船。身為臺廈道員的詩人心中升起一股救民於水火的念頭，用射箭技巧指引船隻登岸的所在，此計奏效，漁船紛紛回歸，詩人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雞籠積雪〉一首，此詩曾被認為是想像虛擬之作，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不相信雞籠真會下雪，¹⁷二是雞籠位居諸羅縣北，在高拱乾的年代，此處為人煙罕至的蠻荒區，故不信他能親臨其地，因此不能作為遊人觀景詩。不過考察高拱乾編修的《臺灣府志》卷九〈外志·災祥〉中曾說明：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冬，始雨雪，冰堅厚寸餘，臺土氣熱，從無霜雪。是歲

¹⁵ 關於仙棗亭的傳聞，見於宋王象《輿地紀勝》卷66：「仙棗亭，故址在南樓西。舊傳亭前棗大，未嘗實，一歲忽有實如瓜，太守命小史採而進。小史輒啖之，遂仙去。」至於巨鰲戴山的神話則出於王逸注引《列仙傳》：「有巨靈之鰲，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之中。」（參見袁珂編著《古神話選釋》頁32-37，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9月四版）

¹⁶ 見《古神話選釋》頁30-31，同15。

¹⁷ 如乾隆間巡臺御史六十七《使署閒情》卷二〈北行雜詠·曉行〉有云：「…未信雞籠真積雪，曉來先試北風涼。」（頁65，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5月）。又嘉慶間吳子光《臺灣紀事》卷一〈臺事紀略〉載：「雞籠積雪為郡志八景之一，亦傳會之辭，臺地稀見霜雪。」（頁16，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9月）。二人均懷疑雞籠積雪的真實性

八月，甫入版圖，運屬一統，地氣自北而南，此其兆也。¹⁸

高拱乾將當年臺灣氣候之大變記錄下來，若以他修志的紀實原則來說，¹⁹當言之不誣，更何況後來還有陳夢林、朱士玠等人爲他背書。²⁰且看〈雞籠積雪〉：

北去二千里，寒峰天外橫。長年紺雪在，半夜碧雞鳴。翠共峨眉積，炎消瘴海清。丹爐和石煉，漫擬玉梯行。

姑不論詩人是實寫還是虛構，在描摩雞籠山的高聳時，多以神仙思想入詩，如峨眉、丹爐、石煉、玉梯等，一如觀日出用咸池，賞晚霞用補天等神話。這種仙鄉化的印象正是高拱乾對臺灣的初體驗。此外，高拱乾畢竟位居統治者階層，因此也展開了官方形塑邊陲臺灣的過程。

四、召喚歷史，記憶臺灣

如前所述，高拱乾來臺，有著類貶謫心情，而此時臺灣成爲海外新疆不過近十年而已，仍然是個陌生之地，因此他所編修的《臺灣府志》，常作爲後人認識臺灣、瞭解臺灣的依據，若進一步考其詩文諸作，又往往可以發現一種優越者姿態，在不遇的情志支配下，他如何召喚歷史以形塑臺灣，便成爲值得研究的議題。

大抵而言，高拱乾將臺灣比作夜郎國，比作西域，認爲這是蕭騷粗鄙之區，需要被重新改造，從而確立了殖民者／被殖民者的關係。

如前所引〈西嶼落霞〉詩中，有「劉郎江上詩」句，係指中唐詩人劉禹錫被貶爲朗州司馬所作竹枝詞，²¹。朗州，即接近夜郎國一帶。高拱乾在澎湖西嶼

¹⁸ 見同 2，頁 946。

¹⁹ 高拱乾於〈臺灣府誌序〉一文中提及其修志原則是「綱舉目張，巨細必載，有功必錄、有美必書，公諸眾心，以觀厥成。斯誌也，亦所以志也。敢曰余一人之私言哉？嗣是而稽水道者，非以海市蜃樓誌怪也；舟楫必由，寓不逢不若之經焉。考廢興者，非以裸髮文身誌奇也；絕域咸孚，見莫不尊親之休焉。覈人材問民俗者，非以昔渾沌而今雕鑿也。」（同 2，頁 267）。可見他力求考實不虛妄的精神。

²⁰ 康熙間陳夢林、周鍾瑄等修《諸羅縣志》卷一〈封域至·形勝〉中云：「臺地夙號燦石流金，雞籠居極北，稍寒，偶爾見雪，遂稱勝耳。」（頁 18，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 6 月）。又乾隆間朱士玠《小琉球漫誌》卷三〈海東紀勝下〉記曰：「雞籠山在彰化縣治。臺地氣候，南北迥殊。北境冬寒，與內地無大異。茲山為北境盡處，山大而高，下逼巨海，名為大雞籠。至冬常有積雪，臺人取以列郡志八景焉。」（頁 34，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年 9 月）

²¹ 劉禹錫於唐憲宗朝因坐王叔文案被貶為朗州司馬。當地風俗鄙陋，家喜巫鬼，每逢祭祀，必唱竹枝詞。劉禹錫無辜受貶，鬱悶不得志，乃仿屈原為楚人改編祭神舞曲，而作竹枝詞十餘首，中

欣賞落日吟詩時，想是以劉禹錫自況，臺澎之於高氏，恰如夜郎之於劉氏，這是邊緣／中心的關係。此外，「夜郎國」在文學詮解中又有「夜郎自大」之意，高拱乾也藉此意對明鄭王國進行批判：

曉來吹角徹蒼茫，鹿耳門邊幾戰場。流毒猶傳日本國，偏安空比夜郎王。
樓船將帥懸金印，郡縣官僚闢草堂。使者莫嫌風土惡，番兒到處繞車旁。
(〈東寧十詠〉其二)

前四句是憶昔，後四句是說今。前言臺南鹿耳門尚流蕩著戰爭號角的餘音，明鄭之據臺，被詩人視為「流毒」(率先攻臺者鄭成功生於日本，是中日混血兒，故有倭國遺毒之意)，當作「偏安」(“中心”失去，故云“偏安”，意謂明亡，鄭成功之子鄭經建東寧王國，自立為王，乃偏安之舉，非正統之真主，只是「偽藩」²²罷了)，將東寧國王喻為夜郎王，諷刺其縱然深知寓兵於農，並致力文教建設，但未能明察時事，妄自尊大，終被剿服。「夜郎」這個漢代的西南小國被用來形塑明鄭時期的臺灣由此可見。至於後四句詩，則訴其當下心情，在此窮山惡水之地，若有草堂築室的隱者之心，便易發現其原始淳樸之美。

此外，高拱乾亦將赴臺任職當成西域出使，故召喚歷史上出使西域的名人張騫、班超來形容己身，如〈東寧十詠〉第一首有云：

天險悠悠海上山，東南半壁倚臺灣。敬宣 帝澤安群島，愧乏邊才控百蠻。
瘴霧掃開新氣宇，風沙吹改舊容顏。敢辭遠跡煙波外，博望曾經萬里還。

這是銜命來臺時的焦慮與自期，同時又帶點望鄉的情緒。臺灣雖有其地理價值，但畢竟是邊陲蠻荒之地，亦不知何時得歸，故來此經營，自然懷想西漢那位出使西域，受封為博望侯的張騫。張騫通西域，帶著戰略考量，進行一場艱鉅的冒險行旅，遂打開了中西交通史。²³高拱乾從歷史找到這位既建功立業，又能平安回鄉的人物，的確為自己帶來極大的鼓舞力量，縱令風沙吹老了容顏，仍然用開闢新宇的重大責任來寬慰自己。此等心情，在他即將任滿陞調內地的詩作中更顯而易見：

索居寂寂近瓜期，報道清班擬暫移。高適豈堪常侍後，班超惟有玉關思。
封侯夫婿何須悔，學步兒曹大更癡。自笑浮名終日累，海濱漫守使君碑。
(〈東寧十詠其九〉)

希冀留名、渴望歸鄉，是他記錄最後一段宦臺歲月的心情。一如威震西域的東漢

有一首云：「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高拱乾乃引以自喻。

²²在高拱乾〈禁苦累土番等弊示〉、〈送臺鎮穆公擢掌禁軍之京序〉等文中均稱明鄭為「偽藩」(《臺灣府志》頁1055、1073，同2)。

²³ 見黃石林《旅行史話》，頁61-67。台北：國家出版社，2005年2月。

定遠侯班超，年老思歸故土，悠悠上書章帝：「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²⁴又如擅寫邊塞戰爭詩歌的盛唐詩人高適在征討犯邊的吐蕃不成後，終被召回任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班、高二人生貢獻於征西與平亂，最後衣錦還鄉，贏得美名，遂成爲萬里煙波外高拱乾召喚的對象，藉此記憶宦臺心情。當然，這其中亦隱含殖民者開疆闢土，宣揚國威的企圖心。

五、結語

作爲清領初期的最高文官高拱乾，雖是蔭生，但比起前兩任臺廈道一周昌（進士）與王效宗（官生）一更有治績，也留下許多臺灣記憶文字。雖然他被後人所記憶的是修府志之功，似乎史料的蒐集編整遠較其詩文著作更具價值，可後者更能直指文人之心，以此爲研究對象，方能顯現清吏初來臺灣的心境與觀察。

大抵而言，高拱乾蒙受知遇之恩，被破格擢升來臺，在恭記皇恩之際，其實內心充滿矛盾。因爲赴任之地是邊陲臺灣，遠離京城核心，因此每有憂思，故作悠遊，與遭貶流放文人相同。然正是這種情境，而成就了斐亭、澄臺的建築、書寫與觀想。於是吾人發現，身爲遊宦者，它具有釋放感官知覺以體驗在地空間感與歷史感的旅行者特質，同時又有開闢新宇、宣威揚名的殖民者心態。前者以〈臺灣八景詩〉最爲顯著，以其耳、目、身、意來書寫景觀，並借境抒懷；後者則多見其〈東寧十詠〉與其他公移序文中，欲令其眼下「舊集閭閻皆斥鹵，新開原野半蓬蒿」（〈東寧十詠其六〉）的臺地能變風易俗，咸被文風，而思鄉之愁、不見用之悲則深寓其中。

此外，高拱乾的〈臺灣賦〉一文呈現濃厚的殖民地書寫風格。其賦作自不同於早先沈光文賦作傾心緬懷鄭成功克復之功，深具遺民之思，也迥異於府學教授林謙光極力鋪陳地理，讚頌臺灣之盛軌的書寫。其間之異同，當覬勉於來日再進行梳理研究。

參考書目（依出版先後排列）

臺灣府志三種（上）清•高拱乾等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5月。

古神話選釋，袁珂編著，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9月四版。

²⁴ 見黃石林《旅行史話》頁67-72，同23，台北：國家出版社，2005年2月。

清代臺灣的官僚體系-北京的辮子，許雪姬著，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年3月。

使署閒情，清•六十七著，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5月。

臺灣文學散論，許俊雅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11月。

臺灣紀事，清•吳子光著，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9月。

諸羅縣志，清•陳夢林等修，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6月。

中國文學的美感，柯慶明著，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1月。

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劉麗卿著，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4月。

旅行史話，黃石林著，台北：國家出版社，2005年2月。

清代臺灣記遊文學中的海洋，陳佳姣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年7月。

清代康熙年間治臺策研究，石弘毅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1月。